

· 文献学苑 ·

# 韩非子读过《文子》吗？

## ——兼谈《文子》的成书与流传

葛刚岩 (武汉大学文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)

【摘要】《韩非子·内储说》中有一条关于“文子”的载录,如何解读这一材料,不仅关乎材料本身,也关联到《文子》的真伪、成书时间等诸多问题。本文从多个方面加以辨析,认为《韩非子·内储说》中的“文子”应是人名,而非书名,此文子的身份也难以确认,更不能依此为依据而断言战国后期的韩非子曾经读过《文子》。

【关键词】韩非 《韩非子》 《文子》

【中图分类号】G256

【文献标识码】A

【文章编号】1003-6938(2004)06-0061-04

《韩非子·内储说上》云：

赏誉薄而谩者下不用，赏誉厚而信者下轻死。其说在文子称“若兽鹿”。<sup>[1]</sup>

有些学者在阐释利用这条材料时，将其中的“文子”直接解释为书名，并以此作为主要证据，认为韩非子曾经读过《文子》，该书的成书时间应在战国中晚期，“我认为《文子》是汉初已有的先秦古籍，这还可从《韩非子》中，看出战国晚期的韩非曾读过《文子》，则《文子》的著作年代，当为战国中后期。”<sup>[2]</sup>那么，这一说法能否成立呢？通过对《韩非子·内储说上》中的这一材料的分析研究，我们认为“韩非曾读过《文子》”的说法难以成立。下面，我们从三个方面对此予以辨析。

第一，《内储说上》中的“文子”应是人名，而非书名。从《韩非子》文本来看，目前《韩非子》的传世本中，此条材料皆记为“赏誉薄而谩者下不用，赏誉厚而信者下轻死。其说在文子称‘若兽鹿’”，“文子”是作为人名看待的。从历代研究来看，研究者也都将该“文子”解释为人名，如马骥认为，此处的“文子”应是齐国的“田文”<sup>[3]</sup>，钱穆《尹文考》中认为应是“尹文”<sup>[4]</sup>。但李定生先生却将其视为书名，他在《论文子》中直接将其引作“《文子》”，并以此为据认为韩非子曾读过《文子》，“《文子》是先秦古籍，在战国末年，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就已看到”，“韩非明白地说其说在《文子》，并称齐王和文子问答如何治国，则韩非见到《文子》无疑。”<sup>[5]</sup>

那么，此处的“文子”能否作为书名解释呢？单从本句孤立地看，句中的“文子”一词既可以看作人

名，解释为：“赏誉薄而谩者下不用，赏誉厚而信者下轻死”这一说法，在文子言语思想中称作“若兽鹿”；也可以看作书名，解释为：“赏誉薄而谩者下不用，赏誉厚而信者下轻死”一说，在《文子》书中记录为“若兽鹿”。但是，从《韩非子》全书的写作惯例和行文格式来看，此处的“文子”应是人名：

1、从《韩非子》的写作惯例来看。《韩非子·内储说》分上、下两篇，上篇主要讲述人君控制臣属的“七术”，即七种手段：一曰众端参观，二曰必罚明威，三曰信赏尽能，四曰一听责下，五曰疑诏诡使，六曰挟知而问，七曰倒言反事；下篇主要讲述为人主者治国安邦的“六微”，即六种隐微的情况：一曰权借在下，二曰利异外借，三曰托于似类，四曰利害有反，五曰参疑内争，六曰敌国废置。在《内储说》上、下两篇中，有多处用了“其说在……”的形式，它们分别是：

(1)、观听不参则诚不闻，听有门户则臣壅塞。其说在侏儒之梦见寃，哀公之称“莫众而迷”。

(2)、爱多者则法不立，威寡者则下侵上。是以刑罚不必，则禁令不行。其说在董子之行石邑，与子产之教游吉也。

(3)、赏誉薄而谩者下不用，赏誉厚而信者下轻死。其说在文子称“若兽鹿”。

(4)、一听则愚智不分，责下则人臣不参。其说在索郑与吹竽。

(5)、挟智而问，则不智者至；深智一物，众隐皆变。其说在昭侯之握一爪也。

(6)、权势不可以借人，上失其一，臣以为百。故臣得借则力多，力多则内外为用，内外为用则人主壅。其说在老聃之言失鱼也。

(7)、君臣之利异，故人臣莫忠，故臣利立而主利灭。是以奸臣者，召敌兵以内除，举外事以眩主，苟成其私利，不顾国患。其说在卫人之夫妻祷祝也。

(8)、事起而有所利，其尸主之；有所害，必反察之。是以明主之论也，国害则省其利者，臣害则察其反者。其说在楚兵至而陈需相，秦种贵而麋吏覆。

(9)、参疑之势，乱之所由生也，故明主慎之。是以晋驺姬杀太子申生而郑夫人用毒药；卫州吁杀其君完，公子根取东周；王子职甚有宠而商臣果作乱；严遂、韩廆争而哀公果遇贼；田常、阚止、戴驩、皇喜敌而宋君、简公杀。其说在狐突之称二好，与郑昭之对未生也。

(10)、参疑、废置之事，明主绝之于内而施之于外。资其轻者，辅其弱者，此谓庙攻。参伍既用于内，观听又行于外，则敌伪得。其说在秦侏儒之告惠文君也。

可见，除“其说在文子称‘若兽鹿’”之外，《内储说》二篇中“其说在……”的形式还有九处，其中第(1)、(2)、(4)、(5)、(7)、(8)、十条中，“其说在侏儒之梦见竈”、“其说在董子之行石邑”、“其说在索郑与吹竽”、“其说在昭侯之握一爪”、“其说在卫人之夫妻祷祝”、“其说在楚兵至而陈需相，秦种贵而麋吏覆”、“其说在……与郑昭之对未生”、“其说在秦侏儒之告惠文君”皆为事件，第(2)、(6)、(9)条中，“哀公”、“老聃”、“狐突”皆为人物名称，其中没有一处是书名的。按此惯例，“其说在文子称‘若兽鹿’”一句中的“文子”也不应例外，同样应是人名。

2、从《韩非子·内储说》二篇的行文格式来看。为了更清晰地阐述自己的理论观点，韩非在《内储说》二篇中准备了大量的历史传说故事，以便作为例子加以引用，“储说”就是这些例子的汇编。每篇都分“经”、“说”两个部分，“经”在前，是理论性的总结；“说”在后，是把“经”中所涉及到的例子一一列举出来，以备细查。比如《内储说下·参疑》，“经”文为“观听不参则诚不闻，听有门户则臣壅塞。其说在侏儒之梦见竈，哀公之称‘莫众而迷’”，与“哀公之称‘莫众而迷’”对应的“说”文部分解释说“鲁哀公问于孔子曰：‘鄙谚曰：莫众而迷。今寡人举事与群臣虑之，而国愈乱，其故何也？’

……”显然，“经”文中的“哀公”与“说”文中“哀公”是相互对应的，韩非将其都是作为人名来加以叙述的。同样，《赏誉》中，“‘赏誉薄而谩者下不用，赏誉厚而信者下轻死。’其说在文子称‘若兽鹿’”一句也属于“经”文内容，与“其说在文子称‘若兽鹿’”相对应的“说”文中，对其进行了详细解释：

齐王问于文子曰：“治国何如？”对曰：“夫赏罚之为道，利器也。君固握之，不可以示人。若如臣者，犹兽鹿也，唯荐草而就。”

这段“说”文中的“文子”明显属于人名，根据《内储说》“经”文、“说”文的对应关系来看，“经”文“其说在文子称‘若兽鹿’”中的“文子”也应是人名。

以上分析说明，“其说在文子称‘若兽鹿’”中的“文子”应看作人名，而非书名。

第二，《韩非子》与《文子》在思想上并非一致。在《韩非读过〈文子〉——谈〈文子〉的年代与原始道家的关系》一文中，李定生先生又从思想角度展开论证，认为《韩非子》的某些思想源自于《文子》，“说韩非曾读过《文子》，除称引其书外，还有其思想来源于文子。”那么，《韩非子》与《文子》在思想上是否一致呢？下面，让我们详加分析。

为了说明《韩非子》与《文子》在思想上的一致，李定生先生列举了今本《文子》中的13处引文，来加以说明，它们分别出自《道原篇》第1、第2、第3章，《九守篇》第9章，《精诚篇》第21章，《道德篇》第12、第18章，《自然篇》第9章，《下德篇》第6章，《上仁篇》第7章，《上义篇》第4、第5章，《上礼篇》第2章。但是，据我们考证，今本《文子》并非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所记的《文子》原书，它是在原本《文子》（即最初的《文子》）残卷的基础上，经过后人两次整理加工而形成的，其中近五分之四的篇幅都是从《淮南子》中择要摘录而来<sup>[6]</sup>。而李定生先生所引用的这13处文字，多属于择要摘录部分，所以以此为据来证明《文子》与《韩非子》之间的思想关系，就显得缺乏说服力。

1973年，河北省定县八角廊40号汉墓中出土了《文子》残简277枚，2790余字。据发掘者考证，墓主为西汉中山怀王刘修或中山孝王刘兴，但更倾向于前者。刘修卒于汉宣帝五凤三年（前55年），刘兴死于汉成帝绥和元年（前8年），在时间上与刘向、刘歆父子校理群书的时间较为接近，所以李学勤先生指出：“无论如何，刘向歆父子所见《文子》应该和竹简本一致，或者是相似的。”<sup>[7]</sup>我们认为，

在新材料发现之前,简本《文子》<sup>[8]</sup>应是研究《文子》原本思想的最为可靠、最为理想的依据。下面,我们就以此为蓝本,看一下《韩非子·内储说》中“文子”的思想与《文子》的思想是否一致。

简本《文子》中的大部分简文都不是完整的句子,这使得我们难以掌握原本《文子》所表达的完整思想,但透过残篇断句仍然能够看出原本《文子》的一些思想倾向<sup>[9]</sup>。其中在君主的御国之术方面,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:

1、主张以德治国,“平王曰:‘王者几道乎?’文子曰:‘王者一道,’”(2419),“故王道唯德乎!臣故曰一道”(2385)。在文子看来,是否有“德”是人主能否治理好天下的重要条件,有“德”便能天下大治,“[文子]曰:‘积怨成亡,积德成王,’”(0737),“有德而上下亲矣,上下亲则君”(2293),无“德”则很难治理好天下,“毋德者则下怨”(0591)。除了强调“德”的重要性之外,简本《文子》也充分肯定“仁”、“义”、“礼”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,“德,则下有仁义,下有仁义则治矣”(0575)。“则下净,无义则下暴,无礼则下乱”(0895 0960)。显然,在这方面,简本《文子》与儒家思想更为接近。

2、在具体的治国方法上,简本《文子》强调因循自然的无为而治,“‘□何?’文子曰:‘执一无为’”(0564),“[天]地大器也,不可执,不可为,为者败(败),执者失”(0870),“是以圣王执一者,见小也;无为者”(0593)。简本《文子》所主张的“无为”,不同于《庄子》中消极被动的无为,而是一种因循自然的无为而治,它主张顺其自然,排斥那种充满个人主观意识的有为政治。这一理论主张与《韩非子》的法家思想是背道而驰的。

3、强调君主的教化作用,不主张法治,“主国家安宁,其唯化也,刑罚不足[以致之]”(2243),“唯”字说明,在保持国家安定方面,教化是最好、最行之有效的办法,而法治在这方面的作用是无法与其相比的,“刑罚不足以致之”。在这一点上,简本《文子》与法家思想是有一定距离的。

我们再来看《韩非子·内储说上》中“文子”的思想。“夫赏罚之为道,利器也”,说明文子非常重视赏罚之道,将其视为治国之利器。“若如臣者,犹兽鹿也,唯荐草而就”,说明文子讲究以术治国。在文子看来,君主必须认识到赏罚之道的重要性,它就如一把御国之利器,实用而有效。在君臣关系上,文子认为君主也需要以术御之,对待臣子,要象对待兽鹿一样,以丰美的嫩草予以驱使。显然,这种思想倾向与《内储说》的总体思想是比较一致的。

以上分析说明,在君主的治国思想上,简本《文子》主要以道家理论为主导,强调无为而治,同时也吸收了部分儒家思想,肯定了德仁义礼以及教化在统治中的重要地位;而《内储说上》中“文子”的思想与《韩非子》全书的思想较为统一,应属于典型的法家思想<sup>[10]</sup>。由此可见,《内储说上》中“文子”的思想与《文子》之间并非一致。

第三,《韩非子·内储说》中“文子”的身份尚难以确定。《内储说上》“说”文部分记有齐平公与文子之间的一段对话,李定生先生认为此处的齐平公与文子即是《文子》中对答的平王与文子,“齐王和文子问答如何治国,这里的齐王,我以为是齐平公,也即《文子·道德》中的‘平王’。”然而查对先秦文献,称平王者只有周平王宜臼和楚平王弃疾,齐平公并无“平王”之称。

检对简本《文子》,我们发现,文子与平王问答时称呼对方即平王为“天王”:

2391 辞曰:道者,先圣人之传也。天王不赍不□

0892 之。天王若能得其道,而勿废,传之后嗣

从语气上来看,这两处皆为文子对平王的劝戒之言。第2391号简文中,文子先借用当时的熟语提醒对方:道是先人总结流传下来的客观规律。然后依此指出平王存在的不足“不赍不□……”;第0892号简文的意思是说:天王你若能得其道,并且始终不舍弃,进而传道于子孙后代,将来就会……。天王者,周天子之称也,“《尚书》之文但称王,《春秋》则曰天王,以当时楚、吴、徐、越皆僭称王,故加天以别之也。赵子曰:称天王以表无二尊是也。”<sup>[11]</sup>应该说,《文子》中的平王解释为“周平王”更为合理(有专文论述)。李定生先生仅凭借《韩非子·内储说》中齐平公与文子的一处问答,而认定《文子》中“平王”是“齐平公”,这一说法明显证据不足,那么,据此而将对话的文子认定为《文子》中与平王对话之文子,就更加缺乏说服力了。何况,先秦时期有“文子”之名称者,大有人在。今查《国语》、《左传》、《战国策》等,称“文子”者就有十七人之多。他们分别是:

1、士文子(晋臣,范武子之子,卒于晋厉公七年。又称范文子、范叔、士燮、燮)。

2、公叔文子(卫大夫,卫献公之孙,又称公叔文子、公叔发、公叔拔,谥号真惠文子)。

3、卫将军文子(卫灵公之孙,公子郢(字子南)之子。又称公孙弥牟、文子木、子南文子、南文子、

宁文子、子之)。

4、大叔文子(卫大夫,又称大叔仪)。

5、文种(越大夫,又称大夫种、文子)。

6、孔文子(卫卿,孔圉之孙,卒于卫庄公二年。又称孔圉、圉)。

7、北宫文子(卫襄公之臣,又称北宫佗)。

8、叔孙文子(鲁哀公之臣,又称叔孙舒)。

9、季文子(鲁臣,季友之孙,鲁宣公八年开始执政,相鲁文公、鲁成公、鲁襄公三世,共三十三年,卒于鲁襄公五年。又称季孙、季孙行父)。

10、孙文子(卫臣,孙良父之子,又称孙林父)。

11、中行文子(晋臣,又称中行寅、荀寅)。

12、知文子(晋臣,又称知伯、文伯、荀跖、知跖)。

13、赵文子(晋臣,赵朔之子赵武,自晋平公十年至十七年将中军)。

14、陈文子(齐臣,陈完之曾孙,又称陈须无)。

15、析文子(齐臣,又称析归父、子家)。

16、田文子(即齐相孟尝君,又称田文)。

17、鲍文子(鲍叔牙曾孙,又称鲍国,谥文子)。

在《内储说上》中,韩非仅仅记有齐平公与文子的一句简单对话,尚无其他材料予以补充说明,怎么就能确信此“文子”就是《文子》中与平王问答的文子呢?如果再以此作为证据,来证明韩非曾经读过《文子》,岂不是更加缺乏说服力了吗?

简本《文子》中,文子称平王为“天王”,说明此处之“平王”应是周平王宜臼。据《汉书·古今人表》记载,在周平王之前,确有一位文子,年龄稍长于周平王,较为符合简本《文子》中平王请教于文子这一事实。再根据简本《文子》中出现的一些秦后字面,如2212号简文中的“朝请”<sup>[12]</sup>,说明简本《文子》的成书时间应在秦之后,最迟不晚于汉初。成书之人依托于春秋之初的周平王与文子之间的君臣问答,以达到托古以贵今的目的。大概在东汉末年至东晋之间,原本《文子》残损,后人在残本的基础

上,经过两次整理而形成今本《文子》,其中既有原本《文子》残存的文字,也借用和抄袭了《老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吕氏春秋》以及《淮南子》的部分内容。之后,又几经流传演变,约在唐玄宗时期,今本《文子》有了比较完善的定本,今天传世的默希子《通玄真经注》、朱弁《通玄真经注》(只存《道原》至《微明》七篇注)、杜道坚《文子缙义》等诸多版本,都是依据该定本传抄而成的。

#### 【参考文献】

- [1] 王先谦. 韩非子集解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98.
- [2] 李定生. 韩非读过《文子》——谈《文子》的年代与原始道家的关系[J]. 哲学与文化, 1996, (9).
- [3] 马骥. 绎史[A].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368 山[Z]. 台北: 商务印书馆, 1983. 43.
- [4] 钱穆. 先秦诸子系年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5.
- [5] 李定生, 徐慧君. 文子校释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4.
- [6] 赵逵夫, 葛刚岩. 今本《文子》的形成与流变[J]. 中华文史论丛, 第81辑.
- [7] 李学勤. 《老子》与八角廓简《文子》[J]. 文物, 1996, (1).
- [8] 定州汉简整理小组. 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墓竹简《文子》释文[J]. 文物, 1995, (12).
- [9] 葛刚岩. 由竹简《文子》看原本《文子》的思想[J]. 甘肃社会科学, 2004, (6).
- [10] 张丰乾. 柳宗元以来的《文子》研究述评[J]. 国学研究, 第7卷.
- [11] 顾炎武. 日知录[M]. 台北: 商务印书馆, 1978, 卷4.
- [12] 张丰乾. “朝请”“诸侯”与竹简《文子》的撰作年代. “简帛研究”网站.

【收稿日期: 2004-08-29; 责任编辑: 王景发】

(上接第58页)国文学流传、发展、演变的途径,这是从传统的目录、版本之学所看不出来的。今天,我们应该着力研究这方面的问题,解决用旧的文献学方法不能解决的问题,来丰富我国古代文学史的内容,丰富和发展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理论。由于这

个原因,同时,也由于敦煌文学作品不限于民间的和唐代的,还包括不少唐以前有传本的和传本已佚的作品,就要求研究敦煌文学者有扎实的古代文学的知识积累,对唐以前的文学有深入的了解。

【收稿日期: 2003-07-25; 责任编辑: 陈 军】